

文韵周刊

一杯热酒读“太平”

——历史剧《太平年》观感



人物名片
著名作家,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,浙江农林大学教授。代表作有《茶人三部曲》《望江南》等。

■ 王旭烽

唐宋之间有一小段历史,世人以为既混乱不堪,又乏善可陈,唐朝近三百年谢幕后,文明便被一道断崖深渊割裂,华夏仿佛突然返祖,生出一个恶魔怪胎,肆意暴虐半个多世纪,上托不住唐,下接不了宋,天长日久,五代十国被描述成一个几乎没有来龙去脉的时空单元。

倘若我们能够完整精细地爬梳五代十国,找到地域的一块金瓯碎片,便会发现,那是一片镌刻着中华文明的全息载体。以往数千年的来龙在此中蕴藏,往后数千年的去脉在此中流淌。五代十国并非只有返祖怪胎,也诞生了人类的优秀极品;五代十国并非只有丛林法则,也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;五代十国并非只有寡廉鲜耻的斯文走狗,也有埋头苦干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。文明的火种没有熄灭过,它藏在一个家族的未理想中,以伟大的纳土归宋为标志。

仿佛就为了迎接一个太平年景下酒杯热酒的和平时光,2026年初,央视播放了反映五代十国纳土归宋历史的48集历史剧《太平年》,而笔者则在不同的景况下连看了三遍。一遍是正式播放前片,十天十夜独自连看50集;第二遍以茶文化使者身份出国,在阿联酋的迪拜和沙迦,从手机中看了48集的多集;第三遍已是回国后的元宵前后了。彼时,迪拜机场刚被无人机轰炸,想起不久前,我们的茶文化访问团在“未来之眼博物馆”流连忘返,二十几个国家的民族遗产团体在月光下歌舞升平,恍然隔世。此时回望千年前的吴越国,钱氏家族的三代五王,那些践行家国同构、纳土归宋、保境安民、和平统一的伟大的先贤们,焉能不感慨良多。

五代十国曾经是笔者攻读历史学时最为头疼的朝代,但毕业论文为灵隐寺概论,还是涉及了吴越国时期的历史留存。21世纪初,笔者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反映吴越国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斜阳温柔》,又在雷峰塔下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签订新编历史剧《吴越王》的剧本创作协议,渐入吴越国文化之堂奥。

浙大浙江农林大学教授,笔者身在吴越国文化的孕育中心临安钱氏故里,写成《王兮兮兮归来——吴越国的君主们》和《吴越一王归马——〈钱氏家训〉释读》两本学术随笔集。2025年担任了浙江广电集团拍摄的五集电视专题纪录片《吴越国》的文史总顾问,近日又完成活剧剧本《吴越国的斜阳》。

在此人文积淀下三看《太平年》,心得当用“澎湃”二字形容。

就吴越国文化自身而言,并无脱离华夏正朔而标新立异、剑走偏锋、别出心裁,核心思想依旧是正统的儒家文化精神,自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,礼义廉耻、忠孝节义、和谐宽容、慎独自省,这些精神一直是作为华夏民族的主旋律思想,支撑起中国文化圣殿的。吴越国可贵之处,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精神返祖的“丛林时代”,始终坚持延续着历史正脉,以社稷为上,就此构成特有的精神气质。

笔者观电视剧《太平年》,有个非常直接的价值导向:盯住吴越国是如何实现纳土归宋、和平统一的。这部作品给人留下了全方位思考,但核心依然回到初心:吴越国为什么要纳土归宋?它是如何纳土归宋的;过程中家国呈现出怎样的关系?是什么精神支撑使历史的参与者完成了这一神圣的跨时代运作。

从《太平年》看纳土归宋,笔者理出四条精神支撑。

首先是众所周知的“祖宗有训,迎候



《太平年》剧照。

华策集团供图



千余年来不断丰富与演变的《钱氏家训》。

真主”。

在宗法社会中,祖宗之法,是最不可撼动的权威。钱弘俶面对的,并非一个突然间从天而降的何去何从之问。这一时代难题,不但从祖父时代起就已存在,并且先人也为此作出了明确答辨。武肃王临终时交代,中原如遇真主,即刻归附。这一基本国策,在吴越国建国早期就已定位,中华枢纽,非中原莫属;我等子孙,以何法违之。故吴越臣服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,使用中原王朝年号,尊奉中原文脉的国家中心,

是因为我们仰望的不仅是浩瀚星空,更是天道有常的法则。随着历史演进,一再证实祖上的判断是正确的,从保境安民,到保族全民,势必会走向纳土归宋。

《钱氏家训》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提供了一道光线:即便是在喉人吸血的至暗时刻,在吴越国,礼乐文明、仁爱精神、秩序规章、诗情画意,依旧在中华家庭中潜伏,在中华家族中珍藏,在中华宗庙中默诵,在星光洒射时修复。因此,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实证。在五代十国,有《钱氏家训》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盛开的精神花朵,更有在祖训指导下的国家命运走向。

相信会有人反问:祖宗何时直言,唯中原方为中国之中?祖宗何时明确提出所谓事大就是事中原?为何我江南吴越就不可成中国之心?

千年前的钱氏三代五王,朝臣间也一定反复论证过此题,最终得出结论,以为中华以中原为中,人心向背,自然聚之,中原不合,天下分崩,我等边陲,终无宁日。两浙百姓,盖因蒙恩华夏前朝气象,百年来和平生息;尤其是钱弘俶,亲见南唐依仗其土地丰饶,欲取代中原,却终无中原正朔血脉气势,故气息日渐羸弱。其余诸国,前蜀、后蜀、大闽、大殷,



金书铁券,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。

南楚,南汉……哪一个不是乍暖还寒,终究式微……故祖宗的经验教训,并非是愚忠僵化执行,而是在实践中印证的真理。

其次为“民贵君轻,社稷为上”。

孟子主张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。钱弘俶继位后,励精图治,下令历年欠税尽行蠲免;境内田亩荒废者“纵民耕之,公不加赋”,民心大悦。又置营田卒数千,以松江辟土而耕,达到“境内无弃田”,粮食丰稔,斗米十文。后周广顺三年(953),境内大旱,民有卖儿女的,钱弘俶下令由官府出粟帛赎回,归还其父母,并开仓赈恤,缓解灾情。

从保境安民,到保族全民,再到纳土归宋,没有一个不是在说天下百姓之命,本就不曾轻于君王;何故为一族之“死节”,使生灵涂炭,灭族亡国,这不符合中国主流文化价值。要知道,凡战争,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,都是要死人的,故李白诗云:“烽火燃不息,征战无已时。野战格斗死,败马号鸣向天悲。鸟鸢啄人肠,衔飞上挂枯树枝。士卒涂草莽,将军空尔为。乃知兵者是凶器,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儒家文化精神通过《钱氏家训》一直在钱弘俶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,故滋生出慈悲爱民的圣人精神,指导

了他一生的英明选择。

第三为“家国同构,谋利天下”。

这块精神基石的夯实,应该是在唐末的最后数十年间。《太平年》出于篇幅所限,未从初起叙述,我们不妨在此回溯。

钱氏一族沿袭黄帝一脉而下,以中原为本,是此族的生命基因,而吴越斯民,自然便是大中华的一部分。故在吴越杭州,有保家卫国的八都义兵,有数起打败侵略军的两浙保卫战,更有平定董昌称帝的护国之举。而唐末朝廷赐给钱氏一族的“金书铁券”,更是划时代的标志。钱氏一族以此作为中华一统的铁证。纳土归宋,对延续三代五王的吴越国君而言,逻辑自治,自圆其说,是一个“本来就是如此,如今回到本来”的闭环。

吴越国作为东南一隅的偏安之邦,从未有过抢夺他国、自立中央、夜郎自大的小国寡民之态。相反,吴越国是以中原为王朝首都而自豪的,对他们而言,“事大”是一个褒义词。故最终的纳土归宋,是一种君臣与国民的多向奔赴。在此之前的近百年间,吴越国从未向中原王朝断绝贡;统一的号角声中,每一次呼唤吴越国都率军出征。尤其是最后两场战争,无论征南唐还是讨北汉,钱弘俶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,亲率大军出征,连赵家天子兄弟都深为感慨。

纳土归宋是一种历史自觉,笔者尤其不赞同把其根本原因归于钱弘俶害怕战争,担忧百姓受难,自家灭族。如果仅从这样的

视角出发,便无法解释吴越与南唐间为何会形成如此水火不容之态。

在历史上,究竟以南北划江而治,还是一个大中华的天下之论,是一直存在的不同政治主张。正因为钱弘俶是一个“中国”的坚定的捍卫者,纳土归宋,最终才会实现得那么丝滑。

故而,钱王不要千年国祚,百年太平足矣;不要穷兵黩武,保境安民足矣;不要舞枪弄棒,饱读诗书足矣;不要声色犬马,举家和睦足矣;不要独性君临,乐土一统足矣。

今天依旧有人,把纳土归宋视为“投降”,视为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,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叶障目式视角,需要更多的传播手段来加以矫正。

四为“六相为一,舍别归总”。

较为遗憾的是,《太平年》几乎没有涉及除儒家之外的任何信仰,而在作为东南佛国的吴越,佛教文化对纳土归宋是起着相当重大作用的。历史上的佛家“舍别归总”思想,是钱弘俶下决心归宋的重要推力。

公元975年,作为吴越国国师的延寿法师圆寂前曾叮嘱钱弘俶“六相为一,舍别归总”。所谓六相,乃“别相、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、总相”,此六相尽在一

切中,亦在一个中,彼此本无碍。“六相为一”是放下一切欲望的重要指导,从消极方面说,它有虚无主义指向;从积极方面说,从中提取出的众生平等、慈悲为怀、救苦救难的大乘精神,是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国君臣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。

我们以钱弘俶的七言律诗《宫中作》(收录于《全唐诗》卷八)为例,该诗推测为其纳土归宋前政治抉择时期所作:

虎虎周遭翠幕遮,禁林深处绝喧哗。界开日影怜窗纸,穿破苔痕恶笋芽。

西第晚窗供露茗,小池寒欲结冰花。谢公未是深沉量,犹把输赢局上夸。

这首诗的重要性,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维度:思考个人在时代进程中所起的作用。就纳土归宋而言,钱弘俶个人气质和性格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呢?笔者以为这是很重要的。这在《太平年》剧中有很好的反映和开局,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,还可以更加地深入。

比如我们从“谢公未是深沉量,犹把输赢局上夸”这两句中,分明看到了他超越局外的价值取向。深宫书院,日影入窗,轻寒微暖,小池薄冰,晚凉露茗。作者借谢安弈棋典故,将心中波澜淡淡析出,世界浮躁世俗,我则淡泊超脱。钱弘俶的内心有禅意、有隐逸,深藏在独立而强韧的个性底层。同为国主,他和李后主自然非常不一样,但就天性而言,在帝王之志上,他们是一样的,都无经天纬地雄心,都有志在他处之念。后主重自尊,钱王重家国;后主重工艺,钱王重佛法;后主溺深情,钱王超格局;后主大偏科大天才,钱弘俶入日常调均衡,他们的性格都影响了他们的家国走向。

回到当下观看《太平年》的语境,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:我们的国产电视剧不断进入世界文艺高端平台,尤其是剧本创作。它跨越了好莱坞式的故事节奏,创造了丰富立体的中国人性格,文言文的精准美妙加之白话文的朴素活泼,使一种别具特色的历史叙述得以亮相。严格意义上说,它不是诞生,而是回归。创作者开始重新捧起文史不分家的久远传统,追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足迹,沉吟于无韵之《离骚》的意境。

它促使人们开始思考:它是如何把巨大的历史伤疤惊心动魄地呈现出来的——比如张彦泽的提刀杀子;如何把掉进夹缝深处的辉煌人性成功打捞上来的——比如水丘昭善的君子气度;如何把人物立体而尖锐的命运塑造在逻辑上合理自治的——比如胡进思的兵变;尤其深刻的是,它如何捕捉那历史的微妙一瞬间,让细密的必然与偶然就此扑面而来——比如周世宗最终停留在光明与阴影的一线之间。其中有太多与当代的对应之处,千年史事与当今职场由此作了某种时尚对接,其先锋锐气的魅力,也越来越使更多的年轻人“入坑”。

归根结底,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创作是真实的中国历史观的胜利。它无声地进行了一场人物定位的破圈运动,否则我们难以想象,“儿皇帝”石敬瑭托孤这样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”的场景能够被表达;桑维翰这个卖国贼的爱国真情和慷慨赴死能够被抒发;李云清的奸细下作与忠诚不二可以并驾齐驱。

在众多人物中,钱弘俶是最具备艺术张力的一位,一方面他内心渴望出局超脱,另一方面他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不折不扣地以身入局。他要在把握好大方向的同时,应对诸多支流分化力量,进行细微耐心的平衡和相对公正的处理;尤其是面对各种纷扰时,如何以大局为重,消除误解,化解矛盾,稳健向前,这与他跳脱的天性是相抵触的。而恰在此时,他又迎来纳土归宋这巨大的历史转折点。

因此《太平年》对钱弘俶的人物张力,似乎还可以有更深入的挖掘。钱弘俶的外在压力和矛盾,在于如何以细致入微的方法找到家国的合理出路;同时,他对故国的留恋与割舍,又极其惆怅、深刻与私密——这是一个人在灵魂依恋和理性判断中的南辕北辙。而这一人物丰厚的“毛边”和品性的自我对立,的确让笔者想到了莎士比亚戏剧。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伟大心灵悲剧,也是无法回避的时代下个人的命运。其实这个问题在赵匡胤的“黄袍加身”时也存在,一个人即便在所有外在理由都充足的条件下,其历史选择如果没有内在理由的加持,人物塑造难免带上了一层滤镜。想要立得住、自圆其说,只有正视真实的存在,在《太平年》这一群帝王设计中,郭威父子的人物塑造就做到了这一点。

长期以来,学界和大众对纳土归宋历史大事件的解读,是较为粗率的,故而我们雀跃于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的横空出世。

由《太平年》引发的吴越文化讨论,后劲尚足。今年春早,陌上花开了,一切美好的事物,尽可缓缓归矣……



《太平年》剧照。华策集团供图



保傲塔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视觉中国供图